



雪域在召唤

——世界屋脊见闻录

张小平 著



民族出版社

雪域在召唤

——世界屋脊见闻录

张小平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域在召唤：世界屋脊见闻录/张小平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 9

ISBN 7-105-02490-9

I. 雪… I. 张… II. ①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②中国-西藏-概况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1560 号

雪域在召唤

——世界屋脊见闻

张小平 著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5 号 邮编 100013)

北京市飞达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6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6.25 字数：42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定价：18.00 元

စံနှုန်းတူအား

စံနှုန်းတူအား

စံနှုန်းတူအား

စံနှုန်းတူအား

စံနှုန်းတူအား

题词译文:

认识西藏,热爱
西藏,建设西藏。

阿沛·阿旺晋美
一九九五年三月

序 言

在人生的旅程中,30年应该算是不短的距离了。

在30年间,他15次攀上世界屋脊西藏,平均两年一次,是我国新闻界进藏次数最多的记者之一;而且,从昌都到阿里,从藏北草原到藏南各地,足迹遍及西藏高原。

30年中,他采写了各类稿件1000多篇,110多万字;而且,他不仅具备做为一位广播记者所应有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他还学过藏语,可以和藏族同胞直接交流思想感情,这使他的文字报道和音响报道独具特色和富有深度。

他两次参加中国和伊朗联合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中国和日本联合攀登纳木那尼峰的采访工作,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一个登山记者,在珠穆朗玛峰登到6600米的高度,并进行现场报道,创造了我国文字记者登山的最高纪录。

他,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高级记者、张小平同志(张小平同志现已赴西藏为援藏干部,任西藏广播电视厅副厅长)。从这几段非常简略的概述中,不难看出他的记者生涯是丰富多彩的,也不难想象他在采访活动中如何不辞辛劳,克服高原反应的种种艰难,不是一般的记者可以相比的。他的报道获得各界听众和有关领导机关的赞誉,是当之无愧的。

可贵的是,张小平同志孜孜不倦,长期潜心研究西藏情况和民族宣传,从实践到理论,又以理论指导实践,系统探讨了民族报道的基本经验和规律,受到中央台和有关领导机关的高度评价。

张小平同志热爱西藏和藏族同胞,热爱民族广播事业。中央台的同志们公认,张小平同志是西藏报道的专家,他的名字已经成为“西藏的同义语”,见着他“必谈西藏”。这是一种无声和无形的荣誉,其价值远远胜过近年来社会上盛行、几近泛滥的锦旗、奖状、奖章之类。他说:“祖国是我的母亲,边疆民族地区是我的第二故乡,

各族人民是我的老师”。他决心“在实践中探索，在实践中前进，使自己真正成为民族内容宣传的内行，为祖国统一、各民族的团结、发展和进步，为中国人民的广播事业奋斗终生”。

我长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也主要从事记者工作和业务研究工作，如今仍然“离而不休”。由于张小平同志的正直为人，由于他的强烈事业心，由于我们从事相同的工作，我很愿意和他交往，凡是遇有西藏或者民族报道工作方面的问题，我总是要寻求他的协助与合作。。可以说，我和他的心是相通的。因此，当他把这部书稿交给我，希望我写一篇序言的时候，我二话没说，欣然应命。在我又来阅读他的这些作品的时候，内心仍然不由漾起喜悦之情，钦佩和祝贺他 30 年辛勤劳动的成果。西藏是一片神奇的、令人向往的土地。如果您想了解西藏，那么，我真诚地向您推荐这本书。只要先看一看目录，您就可以初步了解它的丰富内容，领略雪域风情的诱人魅力，聆听藏族儿女的心声。我相信您从这一篇篇充满激情的报道中，会爱上西藏，爱上藏族同胞，会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各民族亲密团结的大家庭。

杨兆麟

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注：杨兆麟同志是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高级记者。

西藏,永恒的召唤

——写在前面的话

张 小 平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志的眼里,我成了“西藏”的同义语,见面言必谈西藏,还有许多人认为,我就是在西藏工作的记者,是“西藏通”。“西藏通”我根本谈不上,因为“西藏”这两个字的内涵太丰富了,西藏历史、文化、宗教所包容的东西太深刻、太博大了,今生今世我也不会把握住它的全部。但大家把我看成是在西藏工作的记者,我却引为自豪。

中央台一些同志的感觉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从1960年秋天进入中央民族学院,我就和西藏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由于学习和工作的需要,我经常到边疆,特别是西藏采访。从1963年到1993年,三十年间,我曾先后15次踏上青藏高原,从东部的昌都到遥远的阿里,从藏北草原到藏南各地,从拉萨到江孜、日喀则、亚东、樟木,一直到珠穆朗玛峰脚下,雅鲁藏布江源头,包括进入西藏的四条公路:川藏公路、青藏公路、新藏公路、滇藏公路,到处都留下了我的足迹。长时间丰富多彩的西藏采访生活,使我深深地爱上了这片神奇的土地。

我心中的西藏形象

西藏是令人神往的,然而,世人对她的认识却不尽相同。

解放前,我国有极少数的新闻界人士曾到过西藏或与其相邻

的藏族地区；还有许多政府官员、社会学家、宗教工作者也曾涉足青藏高原，并有论著问世，其中不乏颇有见解的作品。但总的来说，为数不多。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许多见诸文字的西藏见闻，往往带有很强的猎奇色彩。与此同时，许多外国“探险家”，包括政客、传教士、学者和少数文化大盗，多次深入西藏腹地，刺探西藏情报，窃取西藏文物，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事情。他们所写的许多有关西藏的专著，也常常与事实相距甚远，一些作品还充满了无知和偏见。在他们的笔下，西藏是一块荒蛮之地，那里遗存的是人类的过去。

解放后，世界屋脊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从那里陆续传出了许多振奋人心的信息，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把目光转向了那片神奇的土地。但总的来说，外界对它仍然知之甚少。即使在国内也是如此。在许多汉族同胞的心目中，直到现在，西藏对他们仍然是个谜，那里的一切都仿佛是陌生而不可理解的。我经常被问及：汉族能在西藏生存吗？拉萨有夏天吗？高原上能吃到蔬菜和水果吗？等等，等等。更有甚者，一些藏族同胞来内地后，又往往引起许多人的惊讶。他们对一些苗条、俊美的藏族姑娘说：“你们不像藏族”；他们对在内地生活、工作或学习，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藏族同胞说：“你们不像藏族”。这些发问和感叹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在他们看来，电影《农奴》中的主人公强巴才是真正的藏族，那个电影里描写的才是真正的西藏。以至使我们中间“谈西藏色变”者大有人在。

为什么人们对西藏认识的反差这样强烈？为什么有人对西藏的历史、文化如痴如狂，把能去西藏看作是人生的一大追求？为什么许多外国人把西藏看成是“香格里拉”，“世外桃源”？“西藏热”为什么在世界上持续百年而不衰？为什么几十个国家成千上万名学者倾其全力热衷于“西藏学”这一独特的学科研究？西藏和藏族的形象究竟是什么？“西藏学”的价值究竟在哪里？这一切，都引起了

我长久的思考。

舆论的力量无疑是潜移默化而持久的。国内外去过西藏的人并不多，但人们头脑里关于西藏的形象却不少。原因何在？应当承认，在当代，这些印象主要来自于广播、电影、电视、报纸、刊物、图书、音像等大众传播媒体；当然，也有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大汉族主义的遗风；古今中外有关西藏的不实之词也对人们的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我以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藏形象的宣传存在片面性，影响了人们对西藏的正确认识。比如若干年前，有关西藏的报道经常提到解放前西藏没有一条公路，没有一所学校，没有一座医院。这显然是不公正的，是缺少西藏历史和文化知识的表现。一段时间里，人们还习惯用“四最”，即“最反动、最黑暗、最野蛮、最残酷”来描述旧西藏。我觉得，这一提法的确反映了近代西藏社会制度的一个侧面，但它却不能概括整个西藏的历史和藏族形象。

诚然，旧西藏有其落后、阴暗的一面，特别是在近百年间尤其如此。但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西藏同样有令人神往的一面，藏族人民也有灿烂辉煌的过去。

做为一个古老的民族，藏族几万年前就开始生息在这块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广阔地区，成为世界上最能吃苦的民族之一；

近年来我国考古发掘成果表明，青藏高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我国伟大的母亲河——黄河、长江都在这里诞生，这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藏民族已有数千年的文明史；

公元七世纪前后建立的吐蕃王朝曾经威震我国西部，其影响远至西亚和南亚；

西藏地处亚洲中部，是多种民族文化的结合部。藏族的历史和文化，包括哲学、文学、医学、戏剧、天文、历算、音乐、舞蹈、绘画、建筑早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某些学科至今为中外学者所关注。敦煌学和吐蕃学已经成为“西藏学”的重要门类；

西藏高原的自然景观、人文特征、宗教气氛，以至于色彩、情调都与外部世界迥然不同，成为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不为外界所知的地区之一；藏民族的形成及数千年的发展史，使我们祖国拥有了一个稳固而可靠的西南屏障。

上述种种，都充分显示了藏民族悠远而耀眼的辉煌。

写到这里，我还想到了与此有关的一些数字和概念：

西藏的面积是全国总面积的八分之一，全国藏族居住的地区（包括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的十个藏族自治州和两个藏族自治县）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

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是除“南极”、“北极”之外的世界“第三极”；

西藏有丰富的地下宝藏，铀、硼砂的藏量居世界第一，锂的储藏量占世界一半，金矿的质量令人叹为观止；

西藏的地热资源居全国之首，水利资源居全国之二，森林资源居全国第三，太阳能、风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西藏现存的藏文史料数量仅次于汉文典籍，在我国各民族中占第二位；

西藏高原的气候影响着全世界；

... ..

上面叙述的种种情况并不是每个人都熟悉的。这些活生生的历史和现实向世人展示的是一个美丽富饶的西藏，一个有深厚历史文化价值的西藏。加上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使它还成为令世人关注的具有极大的社会政治敏感性的地方，那里发生的某些事情，常常使世界舆论沸沸扬扬，“西藏问题”成为某些特定时期的政治热点，人们不得不去了解它的历史、宗教、文化和人民。

这就是我心中的西藏，就是我笔下要描述的西藏。

西藏——永恒的召唤

每次踏上西藏大地，我都会忘情地投进它的怀抱。展现在我面前的永远是一个充满阳光、充满活力、充满色彩的世界。

西藏的山川是千山之祖，万水之源，它拥有海拔 8848.13 米的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天河”——雅鲁藏布江、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天湖”——纳木错。至于朝圣者的天堂——阿里的神山冈仁布齐峰和玛旁雍错湖、喜马拉雅山东段最高峰——南迦巴瓦峰、西段高峰纳木那尼峰，同样为众多的善男信女和登山旅游探险者所梦寐以求。

西藏的资源举世瞩目。西藏的地下充满了活力，那冲腾的地热喷泉、那壮丽的热水湖、那晶莹剔透的冰塔林世界、那绵延几十公里长的亚丹地貌，把西藏装扮成了一个神话般的所在；无人区奔驰的野驴、野牦牛等世界级的珍稀动物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天然野生动物园；西藏东部和南部的原始森林，西藏察隅、墨脱、亚东、樟木的富饶和美丽更是远远超出人们的意料。

西藏的文化色彩斑斓。世界上最高的宫殿布达拉宫是金堆玉砌的西藏历史宗教博物馆；萨迦寺和许多古老寺庙里保存着 1000 多年前的稀世之宝贝叶经，它纪录了青藏高原以至于南亚一些国家的过去；浩如烟海的木刻板典籍是藏族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它的全部内容至今尚未被世人所揭示；西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室内铜佛，有世界上最早的人体生理解剖图；西藏有独具特色的歌舞艺术，它可以使人联想到唐朝的太平盛世和歌舞升平的景象；西藏的建筑艺术独树一帜，宫殿寺院里的壁画满墙生辉；世界文化特产藏戏，则充满了古朴浓郁的雪域情调；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格萨尔》远远超过了《荷马史诗》。

西藏的风情无与伦比。风情是民族特征和民族文化的积淀，它是由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生活条件以及古老遗风造就的。藏族有独特的食品：青稞酒、酥油茶、糌粑，有独特的工艺品：氍毹、藏毯、邦丹（彩色围裙）、木碗、藏刀；西藏的牛皮船、藏式民居、辽阔神秘的无人区游牧文化，以及欢乐的婚礼、圣洁的哈达、奇特的天葬、浪漫的林卡节、沐浴节，还有数量众多的宗教活动，这一切交织成了藏族人民五彩缤纷的生活画卷，而西藏的门巴族、珞巴族、僜人、夏尔巴人又为这一画卷增添了新的神韵。

上述种种，仅仅是随处可见的西藏特色的一部分。每当想到这些，我的面前就出现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一个令人心往神驰的世界。把一个尚未被世人全部了解的世界奉献给人们，把世界屋脊的信息和风采告诉全世界，应当是我们这一代新闻工作者的神圣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西藏高原新闻宝库的开拓者。

做名副其实的广播记者

广播是现代化的传播手段之一，它不受文化、地域、国界、民族的制约，拥有最广大的听众群体。广播与其它媒体不同，它依靠有声的语言、音乐和大千世界的种种音响来描述世界、反映生活、感染听众。做一名真正的广播记者，是我在西藏采访中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个充满音响的世界。在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的阿里，我录下过古老老人的酒歌；在夏尔巴山村，我录下过孩子们的笑声和读书声；在藏北草原，我录下过牧场上的牛羊声；在拉萨三大寺和江孜的白居寺，我录下过古刹的钟声、法铃声以及转经筒那徐缓而深沉的转动声。除此之外，我还录下过才旦卓玛充满激情的回忆、登山英雄贡布的感受、点燃圣火的少女达娃央宗天真爽朗的笑声。在我的录音磁带里还记录了阿沛·阿旺晋美对往

事的怀念，班禅大师藏历新年的热情祝词。在长期的高原生活中，我还记下了帕里的高原盛会、亚东的风情、神山下的祝福；在通向纳木湖的路上，我录下了零下30度中的牧民生活的实况。近年来，我还在黄河源头、金沙江畔、澜沧江之滨、怒江桥头录下了这些大江大河的动人心魄的滔声。为了获取这些声音，我经历了翻车和落马，摔伤和饥饿。回想起来，这一切竟然可以称之为我在西藏生活中的华采乐章。

广播记者的艰辛远不止这些。要获取音响必须亲临现场，这就要求我积极参与、全身心地投入到一切可能得到广播音响的地方。事实上，我也的确这样去做了。登山现场报道的实践就是一例。

1978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機會使我与登山采访结缘，而后一发不可收拾。现在，登山已经成为我观察西藏的一个视角，成为我体验人生的重要经历。

登山采访是在特殊自然环境中开展的一个超常规的新闻实践活动。在我参加1978年中国伊朗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采访工作之前，利用广播手段进行现场报道还没有先例。我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次机遇，而机遇又要靠自身努力去获得。因此，我给自己选择了两条座右铭，一条是：“人生能有几次搏”，另一条是：“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要做到；别人做不到的，我也要争取做到”。

1978年的春天的确令人难忘，我与录音机相伴，一直走到了海拔6600米的珠穆朗玛峰北坳地段，那是一个千万年来从未溶化过的永冻冰雪地带，沿途我看到了近百年来中外探险家遗弃在那里的铁锹、冰镐、帐篷、衣物，我看到了那深不见底、兰光闪烁、寒气逼人的冰裂缝，我看到了地球顶端那块最蓝、最透明、最纯洁的天空，我成为人类社会中有幸与地球第三极如此接近的幸运者之一。在那个令我永世难忘的时刻，高原反应在我身上神奇般地消失了，八九级大的狂风也似乎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我急切而兴奋地打开录音机，变换多种角度，录下了登山队员前进的脚步声，呼啸的北

场风声，也录下了我气喘嘘嘘、上气不接下气做现场报道的声音。天公作美，这录音机上最后的一段磁带记录下了我这个 36 岁的广播记者的真实感受。后来，这段音响成了登山报道中的最动人之处。

1985 年春天，中日登山运动员在西藏阿里纳木那尼峰的拼搏，给了我第二次和高山对话的机会。那年我 43 岁。经过半个月的长途跋涉，我们穿过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冈底斯山、喜马拉雅山，到达中国与尼泊尔、印度交界的阿里神山圣湖区。中日运动员顽强登攀，终于使人类的足迹第一次踏上了海拔 7694 米的纳木那尼峰，藏族运动员用古老的方式，在顶峰扬洒糌粑，献上哈达，那历史性的瞬间已经成为永恒。这次登山采访，我选取了体育和文化相结合的视角，因而我仍然登到了海拔 6100 米的高度，详细报道了登山活动的前前后后。与此同时，我还记录了多彩的征途，神秘的古格王国遗址、梦幻般的扎达地貌、神山圣湖的色彩以及亚洲六大江河源头景观。这些登山的成果，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写出来，因为，溶体育、文化、旅游、科学考察为一体的登山活动的内涵太丰富了，思路一旦开通，可写的东西就多得多也写不完了。当然，最珍贵的还数从一踏上征途就开始积累的现场报道录音磁带，整整 30 盘，30 个小时的真实生活纪录。

在万里高原上拼搏

在北京，不少人曾经关切地问我，你到西藏没有高山反应吗？你天生就适应西藏的气候和生活吗？我的回答是：我和你们都是凡人，我照样要经受高山反应的洗礼。但是，我是以乐观的态度面对这一切的，我把这种洗礼看作是领取进藏采访记者证的过程，看作是把再次登上世界屋脊的梦想变成现实的过程，因而我能从容以对，平静地迎接踏上西藏大地后的第一个考验。事实上，高原反应，

包括我亲身经历过的头痛欲裂、喘不过气、失眠恶心、鼻子流血，都是一种生理现象，是人在突然改变海拔高度（通常是在几小时升高三千米以上）的情况下出现和经历的一种自我调整过程。人是有适应能力的，经过时间长短不等的调整，人是能够在高原上站住脚跟，开拓生活和事业的。

为了在西藏高原上做好工作，在西藏期间，我一直坚持按藏族人民的习惯生活。我认为，生活习惯是一个民族最好的生存方式，是千百年实践中的最佳选择。正是这种信念，使我学会了抓糌粑，喝酥油茶，吃手抓肉、风干肉甚至凉拌生牛肉，我也学会了喝酥油茶、青稞酒、吃炒蚕豆和扁米。1978年登山采访期间，我在穆斯林、汉族、藏族三个食堂中选择了藏族食堂，这使我大大加快了特高海拔生活的适应过程。一个碗里抓糌粑的共同生活使我很快与藏族运动员——我国登山运动的脊梁熟悉。由于我学过藏语，登山期间，我坚持与藏族运动员用藏语交谈。共同的语言又缩短了感情上的距离，因而我能更多、更直接地触摸到登山队员的内心世界，写出有自己特色的广播作品。下山的时候，我的前额晒得乌黑发亮，回京半年后才消失；强烈的高原阳光形成的日光炎症使我的嘴唇溃烂，难以进食。长期的高海拔生活使我消瘦了几十斤，但我的心灵深处是欢悦的，艰苦的百天拼搏使我有机会领略了地球之巅的无限风光，敲开了用广播手段报道登山活动的大门。第二次登山采访期间，我在零度以下的登山帐篷中挑灯夜战，写出了长篇连续报道：《纳木那尼在召唤》和长篇纪实文学《纳木那尼》。这次采访实践使我对登山运动进行了一次宏观上的理性思考，同时对中国西部阿里地区的神秘内涵和历史文化价值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受。

采访夏尔巴山村是另外一种经历。我在20个小时内，连续工作了18个小时。夏尔巴人独特的风情，他们的生活、理想都使我兴奋不已。在这些短暂的时间里，我的日程表是满满的：走访夏尔巴老人、参观夏尔巴人住房、访问小学、看望边防战士、进原始森林、

吃夏尔巴饭、为夏尔巴少男少女的歌舞录音。有限的时间使我获得了超出时间几倍的收获。15年以后，我再次有机会来到这里，旧地重游，浮想联翩，《樟木，边陲小镇不再寂寞》一文如实地记录了我的感受。

1980年的阿里之行，也是一次高难度的拼搏。在长达40天的时间里，我生活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区，走遍了阿里的七个县，可以说是日夜兼程，每天都要在强烈高原反映的情况下采访到凌晨一两点钟。这期间，我在颠簸的汽车里，在昏暗的酥油灯下，做了大量的采访笔记，回京后写了几万字的报道、游记，还整理出了上万字的内参，加上1985年的纳木那尼登山采访，这个被称为西藏高原“禁区”的地方，给我的印象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它为我的人生道路和新闻生涯留下了梦幻般的一页。

纳木湖——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湖。对这个地方的采访是在1982年末西藏最寒冷的时候进行的。当时，许多同志劝我不要翻山进湖区，那样会冰坏手脚。我说，黄金季节的纳木湖，人们了解得不少了，我就是要在人们难以进去的寒冬，亲眼看看纳木湖人是怎么生活的。当时，一场大雪刚过，汽车无法进入湖区，我和藏族记者旺堆决定全副武装、骑马进山。这次采访使我真正领略了西藏牧区的冬天，看到了藏族牧民冬季的生产和生活实况。纳木湖的传说，牧民们刚刚富裕起来的情景，他们舒展的面容和深情的牧歌，使我对藏民族的总体认识产生了新的飞跃。

近年来，在继续涉足西藏的同时，四川甘孜、阿坝，云南的迪庆，青海的果洛、海南、海西，甘肃的甘南等藏族聚居区又留下了我的足迹。这是一个同样博大、深厚的世界，古朴、神奇、粗犷、富有，使它具有与西藏同样的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春天，我有机会第二次乘汽车，对川藏公路的全程（成都——拉萨）进行了一次巡礼式的采访，多角度地报道了西藏40年间社会面貌的变迁；1992年初夏，我做为中央台